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 41 期 2012 年 6 月 頁 153-203

SOCIETA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No. 41, June 2012, pp. 153-203

【研究紀要】

社會／創新如何可能？ 一種塔德式的理解*

陳宗文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A Tardean Perspective on Social/Innovations

by

Tzung-Wen Ch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wchen@nccu.edu.tw

* 本論文初稿曾於 2010 年 5 月在政治大學舉辦之「社會學理論知識的生產、繼受與創新系列研討會」中發表。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建設性意見。

收稿日期：2011 年 12 月 6 日；通過日期：2012 年 3 月 12 日

摘 要

創新是一個世紀以前法國社會學家塔德（Gabriel Tarde）關心的社會現象之一，也因為他對此現象的相關討論，發展出塔德式（tardean）社會學。在社會學奠基的年代，涂爾幹以社會學主體性的立場，加上其所處之正統學術地位，將塔德跨學科的主張擠出主流傳統，也一併邊緣化創新的社會學研究。本論文以塔德的社會學基本理念為基礎，重新檢驗創新的本質與現象。依據塔德所提出的社會律與經濟心理學，社會是基於個人及個體之間的互動而生。對社會的理解，必須進入跨心智介面的層次，即塔德所謂的腦際互動與心際心理學，而以信念與欲望的傳遞為社會關係的基本單元。創新實則信念與欲望的改變。據此，創新不僅是社會基本現象，也是社會變化的條件，以致於社會可以常態性地同時承繼過往並不斷分化。根據塔德式創新理念，晚近一些對於創新的理論或有重新檢討之必要，特別是針對創新的治理，以及企圖區辨經濟與社會創新的作法等。

關鍵詞：創新、社會創新、塔德、模仿律、社會律

Innovation: Toujours Dangereuse

創新：總是危險的

Gustave Flaubert (1913)

一、前言

塔德（Gabriel Tarde）與涂爾幹（Emile Durkheim）共同活躍在 19、20 世紀初，也就是在社會學定調的時代。¹ 塔德主張以微觀的視角理解個體與個體間的模仿現象，作為社會形成的基礎，而與涂爾幹的基本立場相當不同。他們之間的立場差異豐富了當時的社會學內涵。但當涂爾幹進入巴黎大學，開始在社會學學術場域取得正統地位後，塔德在幾年後過世，並其學說主張也迅速為這個世界所遺忘。一直到晚近因「創新」議題的興起，塔德才重新被一些社會學家所重視。本論文將透過重新理解塔德與涂爾幹的爭論點，亦即根據在一百年前社會學發展早期時代的塔德和涂爾幹如何看待「社會」，理出兩者的不同主張，特別針對塔德在社會律（Social laws）所主張的創新觀點予以時代性的解讀，以為後續有關創新研究的社會理論基礎。

本論文的主題曾是社會學的議題，而其失而復得乃跨越將近一個世紀，因此，本論文面對的情境當包括當前主流社會學界對塔德的陌生、對塔德著作與觀點的誤讀、長久以來對社會學範圍界定的自我設限、對社會事實屬性的刻板認定、以及對創新的錯誤認識等。這些現象若得以藉由重新檢視塔德之主要與創新相關的概念，例如

¹ 塔德生於 1843 年，卒於 1904 年，享年 61 歲。涂爾幹生於 1858 年，較塔德年輕 15 歲，卒於 1917 年，較塔德多 13 年，享年 59 歲。

發明 (*invention*) 與模仿 (*imitation*)，並配合其他相關之概念如重複 (*répétition*) 與反對 (*opposition*) 等之闡釋，當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創新的意義。

以下的討論將分為四節。以下第二節將討論創新與社會創新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議題的時代脈絡，說明創新研究之意義。第三節將以社會整合與社會創新兩種立場重新檢討涂爾幹與塔德的爭論議題，特別是對於何謂社會事實乃至於何謂社會學的不同理解。第四節將討論塔德對創新的主張，包括模仿律、心際心理學為基礎的社會機制觀點、重複性與差異性、以及關於社會演變與增長的討論等。第四部分則以塔德的社會觀回應當前的創新研究，檢討塔德的主張於現代社會的適用性。根據以上討論，本文最後將提出對當下創新研究之檢討，據此回應創新之如何可能。

二、創新與社會創新

「創新」(*innovation*) 原是過去社會科學家所關心的一個重要社會現象，這從若干早期社會學家所處理的相近議題可以看得出來，例如塔德對「模仿」(*imitation*) 現象的關心及同時代的齊美爾 (*Georg Simmel*) 對「時尚」的研究等 (*Simmel, 1904*)。但隨後因為社會學知識形式的定型化，特別是涂爾幹以「社會學方法論之規則」為此學科定下基調 (*Durkheim, 1895*)，使後續學者必須在特定的範圍內進行社會學知識的發展，創新的研究也因此被社會學科邊緣化。

即便如此，創新依舊在其他領域裡面持續被討論。這包括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德 (*Joseph Schumpeter*) 對於經濟學的主要貢獻，即以

強調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核心位置 (Schumpeter, 1912; 1942)，而被認為是相當接近塔德對於經濟社會的基本認識。² 這個對創新研究的轉向，其實也符應此一議題與其他學科如經濟學、心理學等之關連性，而具有一種跨學科 (inter-disciplinary) 的意涵。³

社會學家重新開始重視創新的議題，應該是要到七〇、八〇年代以後。至少有兩個因素促使成這樣的轉變。第一個因素是從科技社會學知識發展而來的啟發。科技社會學在孔恩 (Kuhn) 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之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隨之而起的是範圍更為廣泛的「科技與社會」(STS) 新興領域，其中即包括有關創新的研究成果。例如知識社會學家 Mulkay 早期基於莫頓式 (Mertonian) 科學社會學對孔恩的回應 (Mulkay, 1972)，稍後一群科技社會學家提出的技術系統 (technology system) 概念、對「創新」與「使用」的解析等 (Edgerton, 1999)。在這個脈絡下，社會學家尋求對於科學與技術創新的社會詮釋。

第二個因素則是來自於現實社會發展的誘導。從二次大戰以後的大科學 (big science)、到七〇、八〇年代的技術、一直到九〇年代開始重視「知識」，領先發展國家的公共政策背後都有特定的創新意圖。這個發展的軌跡是從科學家的積極投入開始、繼而經濟與管理專家的介入、一直到晚近有更多的包括社會學家在內之社會科學

² 關於熊彼德與塔德之間的關係，普遍上認為僅是在理念上的相近 (Taymans, 1950)，而非有直接的影響。但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熊彼德出生於 1883 年，在其求學時期或者正逢塔德學說盛行之際，當有受到塔德的直接影響 (Michaelides and Theologou, 2010)。

³ 事實上，塔德在其另一部重要的著作經濟心理學 (Psychologie économique) 中，就是以心理學和經濟學的觀點來討論發明與模仿的社會意涵 (Tarde, 1902a)，也就是創新相關的議題。這部書以社會律開啟三大部分的討論，亦即以重複、對立、以及適應來解釋社會中的經濟生活各種現象。

家參與。尤其從科技創新、經濟創新、再到文化創新的歷程，在晚近隨著全球化市場經濟的發展，刺激新經濟社會學（New economic sociology）的興起，也帶動一批社會學家關心起創新的議題。因此，晚近在若干學科領域中，使用「創新」一詞也具有精神層面上的創新意涵，有學科本身追求自我挑戰過去，與傳統區別的意味，而儼然成為實踐層面上的現代性甚至後現代性的現象。

從社會學主流立場來理解前述有關創新現象之脈絡，實則創新一詞隱約帶著利益的味道。因此，為了排除這種味道，人們造出了「社會創新」一詞來區別與其他明顯有經濟利益的創新現象，並用以強調此類創新著重在公共利益，而不同於其他偏向個人經濟利益的創新活動（Pol and Ville, 2009）。甚至經常帶著「照顧弱勢」或特別針對第三世界等較為落後地區等，具有消弭社會不平等的使命色彩。⁴ 然即使「社會創新」一詞有其特定的範疇，可與商業（business）或科技（technology）的創新區別，但仍有相當之模糊性（Dandurand, 2005）。故其仍是一個有待進一步研究開發的領域。

社會學家從關心創新，到退出創新的研究，再重新進入創新的討論，至少有兩個重要的意義。其一方面反映出不同時期的社會學家如何透過議題的討論來確定自己的社會觀點與立場；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一種可能的社會學「理論創新」，居然會有那麼一點歷史再現的味道。這部分從晚近興起的一波重新閱讀塔德之風潮可見一斑（Mucchielli, 2000; Toews, 2003; Borch, 2005; Katz, 2006）。在這波

⁴ 如隸屬於牛津大學 Said 商學院的 Skoll 中心（Skoll centre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或隸屬史丹佛大學商學院的社會創新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cial innovation），雖一樣屬於商管學院，但在主要研究議題的選擇上，都有故意排除營利屬性的現象。

風潮中，不少的學者如羅傑斯（Everett Rogers）、Kinnunen（1996）及 Katz（1999; 2006）等人，皆把塔德稱為「創新擴散」之父，認為是塔德最早提出描述擴散的模型。以羅傑斯為例，在其創新擴散一書中，對塔德如此評論：「塔德對 S 曲線分析時，也聯想到擴散溝通網絡，儘管那時他還沒有使用意見領袖、溝通管道、同質性和異質性等這些現代常用的概念」（Rogers, 1995: 40）。然而遺憾的是在羅傑斯的書中，卻沒有論及塔德的社會觀，而僅以塔德的 S 曲線（S-curve）為核心，衍生出相關的討論。⁵ 儘管晚近 20 年以來拜相關學科知識與科技進步之賜，得以依照羅傑斯的詮釋以更為精確的語言與實例來描述 S 曲線可以發生的諸般條件，但其終究是為了建立一套規範性的知識系統，以提供創新治理之用，而與塔德的基本理念大異其趣。

實則論及社會創新，當有其背後對於「社會為何」的認識基礎，並對社會現象如何詮釋的基本假設。即如部分機構或學派，主張社會創新應與社會創業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結合，或應特別強調社會興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的重要性。⁶ 這樣的主張，在於社會創新是由特定行動者致力發起推動而成，是一種刻意的行為。另有主張社會創新有賴公部門的支援，而非民間部門可以完成。這種主張在於將社會創新視為以「公共財」為標的的創新，由於缺乏經濟誘

⁵ 羅傑斯著作的重要性在其以相當廣泛豐富的實際素材，提供有關創新擴散現象的詮釋依據。他因此列出決定創新擴散的四大要素，包括創新標的的屬性、溝通管道、時間或序列、以及社會體系等。創新擴散一書像是一本使用手冊，是用創新擴散的語言來涵蓋各類有關創新的議題，而普遍帶有實證的色彩，甚至是一種規範性的討論，意圖提供讀者一種具有較佳傾向的行動邏輯，目的當然就是要促進創新的實現。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在 Wejnert（2002）討論創新擴散時看到，只是其將相關因子分為三大類，分別為創新標的本身、創新者、以及創新的社會情境。

⁶ 例如前述牛津大學的 Skoll 中心。

airiti

因，難以吸引民間個人或組織投入其中，勢必藉由政府或第三部門推動始得完成。⁷

以此看塔德，塔德其實是為了瞭解社會談創新，而不是為了治理創新談社會。當塔德以模仿律一書揭示其有關創新的核心主張時，其主要旨趣並不限於 S 曲線，或僅止於創新擴散的描述，而是意圖藉由模仿律來瞭解社會是怎麼一回事。模仿律僅是塔德社會律（social laws）中的一部分，唯有完整檢視塔德的社會律，甚至是用社會律來解釋經濟生活的經濟心理學（*psychologie economique*），才能夠瞭解究竟創新與社會的關係為何。

三、社會創新與社會整合

（一）如何理解社會

塔德與涂爾幹同處一個巨大動亂的時代。在 19 世紀末接近 20 世紀的那個年代，普法戰爭後的法國表面上欣欣向榮，有看似繁榮的世紀末世界博覽會，卻也有荒謬至匪夷所思的德雷佛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層出不窮的表裡不一、相互矛盾的現象，包括都會生活中的疏離冷漠、自殺現象，都刺激涂爾幹去尋找一種可能解釋動亂中仍存的秩序的可能性。對涂爾幹而言，「集體」是最具有吸引力的面向之一，特別是在感受到個人面對時代的無力感之餘（Martuccelli, 1999）。即如 Gustave Le Bon 將群眾現象視為是一種沒有理性的亂象（Le Bon, 1895/1988）。孔德（August Comte）是涂爾幹的靈感來

⁷ 例如由 Young Foundation，就是在這種理念下設立。

源。但是在實證精神的壓力下，如何找到一個可以凝聚社會的正當解釋？涂爾幹在真空的社會中建立起「以太」(ether)一樣的集體性，是可以外在於個體而存在。

同樣地，塔德雖然也看到集體現象，也傾向從心理學來理解社會，但他與涂爾幹一樣並不贊同以 Le Bon 的「集體心理學」或「群眾心理學」的途徑來理解 (Tarde, 1898b: 1)。塔德的社會觀點主要受到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和古諾 (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的影響。⁸ 前者主要貢獻在塔德式社會觀的分析與理解單位；而後者則是一種趨向單純與普遍性的思維邏輯，用以形成塔德的整體社會思維，即如塔德所言：「我嘗試勾勒出一種純粹的社會學 (sociologie pure)，也就是一種一般性的社會學，即如我所瞭解，其中的法則適用於當下所有的社會，而如同一般生理學的法則適用於所有生物物種一樣」(Tarde, 2001: 58)。因此，塔德認為「一切事物 (toute chose) 都是社會，所有現象 (tout phénomène) 都是社會事實」(Tarde, 1999a/1893)。

雖然塔德和涂爾幹都受到孔德很深的影響，但在各自的社會學發展歷程中，卻受到不同立場的學說而左右。塔德就受到古諾相當大的影響。在對於何謂社會學這件事上，孔德與古諾的觀點是非常不一樣的。即如塔德所言，古諾是一位「經過淨化 (épuré)、濃縮 (condensé)、細煉 (affiné) 後的孔德」(Tarde, 2001: 59)。古諾對社會的主張原本就不及孔德之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取向，因此，古諾雖也

⁸ 特別是古諾，塔德在模仿律一書的扉頁上題獻該書予古諾，並在該書序言中說明古諾對其深刻影響：「在我感到沈悶的一段青春歲月裡，由於眼疾而僅能讀一本書時，正是古諾的一本書使我不致於思想貧困」(Tarde, 2001)。塔德另有一本著作闡明其所認識之古諾的歷史與社會科學哲學 (Tarde, 2002)。

對社會有許多的獨特觀察，卻不堅持使用「社會學」(*sociologie*)一詞來涵蓋這樣的認識 (Leroux, 2004)。受到古諾的影響，塔德同樣在社會學的「目的性」上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而有別於涂爾幹強調整合的意義。塔德和涂爾幹間不同的社會觀，導致他們不同的現象偏好，也造成了不同的理論進程。

雖然塔德和涂爾幹在社會學的研究進程上有相近的主張⁹，但後人們記得的卻是他們之間的論戰甚至舌戰。¹⁰ 這其實是基於二人對社會學本身的不同認知。他們對「社會事實」(*fait social*) 的不同定義，決定了選擇怎樣的觀點來瞭解社會。涂爾幹對社會事實的定義：

凡百動作狀態，有定或無定，是由外界的強制力而使個人感受的；又或一種強制力，普遍的存在於團體間，且有他固有的存在性，壓迫個人，而使個人感受的，叫做社會事實。(Durkheim, 1895:19)

涂爾幹以「非個人」(*impersonnel*) 來解釋社會中的事物 (*choses*)。因此，如文法、法規、神學、甚至是個人精神狀態 (*esprit individuel*) 等，都是決定個體的要素 (*facteurs*)，而不是基於個體層次的功能 (Tarde, 1999b: 124)。對於涂爾幹把這些要素都視

⁹ Terry Clark 主張涂爾幹和塔德在社會學研究的資料蒐集、透過經驗分析來取得證據的專業能力、以及推論所需要的邏輯分析等方面，都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 (Clark, 1969)。

¹⁰ 塔德與涂爾幹的口頭辯論發生於 1903 至 1904 學年，於巴黎的高等社會研究學院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sociales*)。詳細內容參考 Durkheim (1904)。2008 年由一群包括 Bruno Latour 在內的學者，重新發掘這論戰的意涵，並根據塔德和涂爾幹的各種著作摘出其中的關鍵論述，模擬一場實戰辯論，詳見 Vargas et al. (2008)。

為外在且獨立於個體，並以如同陰影一般籠罩著個體的方式來理解，塔德深不以為然。在塔德眼中，涂爾幹式的社會事實是：

帶有社會性質的個別事實，並不是社會事實的要素，而是其體現；社會事實本身則是一個優勢的範本，柏拉圖式的理念、獨一無二的範本——是千真萬確的範本。(Tarde, 1969: 117)

因此，判斷一個「涂爾幹式」的社會事實，依據的是其強制性 (coerciveness)，而非普遍性或模仿性。對涂爾幹而言，關鍵在於社會 (整合) 是如何可能的。但塔德卻不太在乎這個「整合」的社會，因為「只有個體的行為和互動。其餘的只能是形而上的標的，也就是神秘主義」。¹¹ 塔德主張的社會事實應可分為兩類：以心際作用互相影響 (*agissant intermentalement*) 的人群，以及行為的集群 (*groupes d'actions*)。前者如家庭、階級、國家等；後者則如語言、道德、制度之類 (Durkheim, 1904)。塔德認為社會事實應當有實質的內涵，而不是只有一些名詞。因此，必須從直接的事實來理解社會。甚至他說：「社會即是模仿」，¹² 而且「社會學家必須接受心理學家的語言」。¹³ 這句話並不是說社會學不重要，而是在基本的層面上，心理學可以協助社會學家掌握若干原則。社會學家在某些現象的理解上，應當可以借用既有的知識或工具，未必為了社會學而社會學。

¹¹ 原文：*Il ne peut y avoir qu'actions individuelles et interactions. Le reste n'est qu'entité métaphysique, que mysticisme* (Durkheim, 1904)。

¹² 原文：*Qu'est-ce que la société? nous avons répondu: c'est l'imitation* (Tarde, 2001: 134)。

¹³ 原文：*Ici le sociologue doit céder la parole au psychologue* (Tarde, 2001: 134)。

涂爾幹對於社會性的堅持使其對塔德的論點非常不以為然。在其 1893 年提交的博士論文《社會分工論》(*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中，就多處抨擊塔德的主張。例如在書中第 282 頁提到比較分析時，就批評塔德採用暫態資料比較之謬誤。涂爾幹甚至在 1897 年所著的「自殺論」一書，特別用一個獨立章節來批判塔德的模仿律。在自殺論第一篇的第四章，涂爾幹故意將標題定為「模仿」(*imitation*)，擺明了就是針對塔德的核心論點，也就是為了推翻作為社會形成基本行動單元的模仿概念。只是涂爾幹別有用心地採取一種極端狹隘的定義來處理模仿性。涂爾幹開宗明義定義了三種可能被認為是模仿的類型：受到共同的影響產生的相同行為、為了某種目的而產生的相同行為，以及僅因為單純地看到或聽到就不假思索採取的相同行為。涂爾幹定義第三種才是真正的模仿行為，但卻也是一種沒有智識的活動，是沒有社會意義的。當然塔德不會接受這樣的指控。但往後的人讀涂爾幹多過塔德，也就因此接受涂爾幹的主張。即如盧曼也受到涂爾幹的影響，主張塔德的信念是一種即使沒有「知識」，「秩序」仍得以存在於社會的解釋方式 (Luhmann, 1998: 98)。

事實上，塔德並不指望客觀社會中的秩序。對塔德而言，所謂「社會學」有兩大錯誤 (Joseph, 1999)：一是全景的 (*panoramique*)，另一是歷史的。所謂全景的錯誤或誘餌 (*leurre*)，是主張對社會的認識必須提昇到夠高的位置，以致於可以觀得社會整體的全貌，如此方能全盤瞭解社會為何物。至於歷史的誘餌，則是主張社會事實必須從發展的公式 (*formules*) 裡面挖掘出來。換言之，社會學的錯誤是建立在一個已然存在的「社會實體」的假設裡。

涂爾幹以降的主流社會學因為假設有一個已然存在的社會實體，在論及社會的動態過程時，傾向以「社會變遷」和「社會運動」等

角度來看待。論及創新，則其至多僅為變遷或運動的一種形式，甚至只是一種偶然的、相對邊緣性的現象。涂爾幹並非排斥使用「創新」一詞。在《社會分工論》中，可以找到五處提到創新，但都是一種附帶性、邊緣性的用法：「沒有創新」、「創新是例外的」、「避免創新」、「微弱的創新意圖」(*les vellétés d'innovation*)或「反對創新」等(Durkheim, 1893: 44, 193, 269, 279, 283)。從其敘述方式可見這些語詞全都偏向負面表述，亦即並不以創新為旨趣。

但在塔德的社會觀下，創新是一個由某等特定人士發起的一個新事物，經由互動擴散成為一種局部的秩序，而得以穩定存在的變遷過程，而且此種過程不停地發生，社會也因此可能。即如表一所列，塔德的主要著作中（原書名對照附錄一之著作列表），毫不猶豫地使用「創新」一詞。塔德應當是古典社會學家中，使用此一詞彙最多的一位。創新的核心精神就是「新的」(*nouveau*)，而有別於強調「不同」的「變遷」(*changement*)或具有挑戰意味的「運動」(*mouvement*)。「新的」牽涉到主觀的判斷，帶有價值色彩。「不同」則較為中性。而帶有價值色彩也同樣是強調客觀的涂爾幹社會學所反對的。

表 1 塔德主要著作中使用「創新」一詞的頻率

著作	「創新」出現次數
《模仿律》(<i>Les lois de l'imitation</i>)	45
《社會邏輯》(<i>La logique sociale</i>)	25
《社會律——社會學概論》 (<i>Les lois sociales. Esquisse d'une sociologie</i>)	6
《經濟心理學》(<i>La psychologie économique</i>)	32

資料來源：整理自塔德著作，參考附錄。

創新另又有行動的意味。變遷談的是整體外部的型態，創新卻是內部或自主或被動的行動。創新因此帶著一種行動方案的意義。社會運動也帶有行動意義，但社會運動通常談的是以體制外行動來對既有體制發動攻擊，而非同創新是在體制本身甚至是在體制內發生。更進一步而言，社會運動的行動對象是一個具有權力的集體，但創新卻是那個權力集體下的個人行動。於是，因為承襲不同的思想脈絡，也因為對社會現象的不同意念與理解立場，塔德和涂爾幹選擇了不同的關懷問題。他們一個投向理解社會的變異過程，另一個則致力於尋求社會秩序的穩定機制。雖然都是關心社會如何可能，但前者其實關心的是社會「創新」如何可能，後者則是社會「整合」如何可能。

（二）塔德的復活

人們對社會的理解一方面具有世代性的共同背景，另一方面也受限於學思傳承與創新的情境偶然性。塔德在世聲勢不亞於涂爾幹，甚至享有海外名聲（Tosti, 1897）。但他過世之後，很快就被遺忘。法國社會學家布東（Raymond Boudon）在 1971 年的著作中就指出塔德式的社會學難以被當代社會學社群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其研究需要依賴貫時性的（diachronic）資料與分析技術，而這方面是與涂爾幹同時代的大環境難以配合的條件，不少塔德的論述由於沒有技術性的奧援，只能流於想像，而沒有數據實證的基礎（Boudon, 1971: 75）。此外，更由於塔德主張社會中創新的反制度與反秩序本質，此亦導致動態與創新的社會研究難以自成一套制度或秩序。相較於塔德的情況，基於共時性（synchronic）的涂爾幹式論述在於社會是客觀存在的，使得「社會學」更具有一門學科的正當性。涂爾幹優於思想

「框架」(framework)的建構，在一種「社會的」(social)模型的想像方面，進一步提供較具客觀性的視角，亦是符合當時對「科學精神」追求的政治正確性。從目的性的角度來理解塔德與涂爾幹的學說主張，或者也是除了制度性的解釋以外，¹⁴ 另一種有助於理解何以涂爾幹最終會擁有正統社會學發言權的詮釋途徑。

然而自從 1980 年代中期以來，有愈來愈多的機會看到塔德這個被遺忘的名字重新被提及。這個現象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說明。首先是研究工具的進步。塔德在其著作中提到的許多現象，尤其是在統計方面的潛在現象，在塔德所處的時代是沒有辦法被驗證的。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網絡分析技術的興起與進步，無疑為塔德

¹⁴ 所謂「制度性」解釋，就是把涂爾幹取得巴黎大學教職當成是知識傳授與傳承的正當性位置，而有別於塔德僅能在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對一般民眾教學。塔德晚年被任命為法蘭西學院現代哲學 (*Philosophie moderne*) 的講座教授。法蘭西學院不是大學，也不像法蘭西研究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一樣設有終身名譽頭銜的院士機構。法蘭西學院讓講座教授開課講學，但對象不限於學術界人士，而是一般大眾都可以參與課程，聽課者僅是抱持著對知識的好奇心而來，並不能把塔德的理念具體化為可以持續傳遞的正統知識。因此，相較於一般大學的課程具有針對性，並有研究生論文的制度性支持，法蘭西學院的課程所傳遞的知識比較難能穩定在社會上維持，更不易傳承。塔德在 1904 年過世之後，此一講座位置為伯格森 (Henri Bergson) 接任。事實上，在接任塔德位置之前，伯格森已經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教授，並也早就是法蘭西學院希臘與拉丁哲學講座的教授。伯格森的哲學理念雖亦多少受到塔德的影響，但在學術聲望與制度性支持各方面，顯然都遠超過塔德生前所有，其主張之知識脈絡自然也不會明明白白地去牽扯與塔德的關係。諷刺的是，雖然塔德強調信念與欲望的力量作為模仿與社會成立的條件，他自己的學術主張不僅在法蘭西學院內無法被傳承，在外面整個學術體系裡也受到涂爾幹勢力的擠壓。涂爾幹在巴黎大學中可以授課予大學生，更得以指導研究生寫論文，使得其學說理論可以持續傳承擴散。這是一般對於塔德式社會學之所以會完全為涂爾幹式社會學消滅的正統解釋。

所持之社會創新觀點帶來一種可以驗證的機會。因計算技術及網路技術的發展，當前的動態統計技術已經可以看到塔德的一些預測已經可以實現。例如晚近藉助新的分析工具重新對 19 世紀末自殺率的地理分配狀態進行分析時，發現在都會型地區的自殺確實具有模仿現象，是比較接近塔德的主張；而在廣闊地區呈現出來的結果，才比較像是具有是涂爾幹式社會結構的控制效果（Baller and Richardson, 2002）。此外，地理空間研究的學者也逐漸重視塔德的模仿論主張（Borch, 2005）。

其次是配合科技變遷的後現代理論發展，有部分的主張與塔德的論述可以產生一種時代性的相互呼應。例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對後現代社會的觀察裡就帶著相當程度的塔德式觀點。塔德主張的重複性與不連續主張啟發了德勒茲的博士論文，該論文出版即以「差異與重複」為書名（Deleuze, 1968）。許多學者會注意到塔德的存在也是受到德勒茲這本書的影響。德勒茲還在其另一部重要的著作「千高原」（*mille plateaux*）裡正式對塔德致敬（Deleuze, 1980）。事實上，千高原這部書的標題本身就是對塔德的一種正面回應（Alliez, 2004）。

當然，對塔德的重讀也有可能是「誤讀」。會讓塔德復活的最大原因之一，如前所述，正是創新研究的日益受到重視，尤其是由羅傑斯所主倡的創新擴散研究。但除了偏向實用的創新研究，另一個與創新有關的趨勢，則是「方法論上的互動主義」（*intéractionnisme méthodologique*）的興起，尤其是以法國社會學家拉圖（Bruno Latour）為代表的「轉譯」（translation）社會學觀點。這一派的學者在追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攀附上了幾乎成廢墟塔德城的堡壘上，為塔德搖旗吶喊（Latour, 1999; 2001; 2005）。拉圖藉由塔德的主張將其

「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 往前連結到古典社會學的時代。為了建立起此一觀點的正當性，拉圖稱其乃承繼塔德的社會學主張，¹⁵ 是一種「關係社會學」(sociology of association)，而有別於涂爾幹式主流社會學之「社會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the social) (Latour, 2005)，有意重啟一百多年前與涂爾幹的論戰。隨著 ANT 及關係性的社會觀點在 21 世紀逐漸變為顯學，塔德的能見度也逐漸提高。

四、社會創新的內涵

(一) 創新傳播的三個階段與 S 曲線

一些學者認為塔德的最大貢獻之一是針對創新擴散所提出的 S 曲線模型。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應該是羅傑斯，他在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Rogers, 1995) 一書中，指出塔德在 1903 年的著作裡「畫出」(plotted) 一條 S 曲線。但其實塔德是用一種形象來描述他的發明模仿三階段規律，並沒有真的在著作中畫出一幅曲線圖。羅傑斯的說法對於理解塔德的主張的是危險的，因為塔德的主張不能被簡化為一種線性且既存的社會觀。本節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塔德的主張與 S 曲線對比，並進而理解社會意涵。

¹⁵ 2005 年拉圖從服務超過 20 年的巴黎高等礦冶學院 (Ecole des Mines) 轉到巴黎政治大學 (Sciences Po)，原因之一在於巴黎政治大學有大量塔德的文獻檔案，拉圖有意在此挖掘塔德的遺產。當拉圖稱塔德為 ANT 的祖父，言下之意是拉圖自己當 ANT 之父也不為過。

塔德對模仿擴散 (*diffusion imitative*) 的描述是建立在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上。這三個階段是信仰 (*croyance*) 或欲望 (*désir*) 的傳播歷程，分別是「緩慢地進展」(*lent progrès au début*)、「快速進展並持續加速」(*progrès rapide et uniformément accéléré*)，以及「進展速度減慢直到停止」(*ralentissement croissant de ce progrès jusqu'à ce qu'il s'arrête*) (Tarde, 2001: 186)。或者用比較具有畫面的描述，三階段是「一個緩坡、一個相當陡峻的山坡、以及一個坡度的修正直到一個高原」。就是塔德勾勒的這個形象讓後續的學者如羅傑斯把如圖 1 之 S 曲線畫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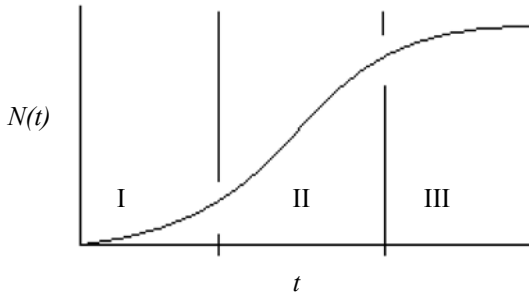


圖 1 S 曲線及其包含的三個階段

但塔德的模仿過程並不是一條單純的 S 曲線，即如數學上之 Sigma 函數（或稱為 Sigmoid function），而是有相當豐富的社會意涵。即如社會學家 Coleman 等人在研究創新醫藥採用的網絡關係時，發現到在累積的採用量上，雖然具有 S 曲線的效果，但每一種效果背後都有非常複雜的網絡類型 (Coleman et al., 1957; 1966)。而且這個研究在若干年後重新被拿出來討論時，甚至有非常不一樣的詮釋結果 (Von den Bulte et al., 2001)。

在擴散的三階段過程中，塔德認為最重要的階段是第二個階段。他指出，雖然統計學家會特別去注意第三階段，因為那是終極最穩定的階段，也是最顯著的階段，但是在第二階段卻有一種向上提升的「力量」(*énergie exacte des forces*)。他說道：「就是在這個中間的階段有一種力量，就是相應的創新在人心的烙印」(Tarde, 2001: 187)。而此一階段也是塔德所謂最具有理論性意涵的部分。

塔德用創新來指稱這個過程，但大多數延續塔德的研究卻只看重「擴散」(*diffusion*)，並將擴散的概念擴大到替代模仿或創新的地位，以致於關注的焦點是影響擴散的因素(如 Rogers, 1995; Wejnert, 2002 等)。這裡要特別指出，人們一旦將分析標的放在擴散時，心中就已經有了一個客觀存在社會，而不像塔德所指稱的，是因為模仿而有社會。當塔德提出擴散的概念，實則要引出創新中的力量，就是信仰(*croissance*)與欲望(*désir*)。塔德認為是信仰與欲望「作為發明與模仿的實體(*substance*)與力量(*force*)」。而且，信仰與欲望原為「心理量」(*quantités psychologiques*)，但一旦參與在發明與模仿的過程，即成為「社會量」(*quantités sociales*)。具體而言，例如語言中的用字、宗教中的祈語、一國之行政、法典中的條文、道德中的義務、產業中的工作、乃至於藝術中的過程等，都屬於社會量的形式。

塔德喜歡用當時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概念來對比他所關心的人際社會現象。但當他在使用「心理量」、「社會量」甚至「力量」這些語詞的同時，卻沒有使用物理學的工具來描述這些數量或現象。後來的人在討論塔德的概念時，也不曾有這樣的嘗試。¹⁶ 實則用一些簡單的物

¹⁶ 當然，在一些純粹討論創新擴散模型的專著裡(例如 Vijay Mahajan and Robert A. Peterson, 1985)，會有較為具體的數理分析模型可供參考，但與本論文所主張的，也就是去瞭解塔德所關心的「社會如何可能」的根本意義並

理學或數學的符號算式來代表這些數量、速度與力量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更瞭解塔德和涂爾幹的差異，也能提供一種對所謂的外在強制力或內在模仿力量更簡潔具體的陳述。例如，如果我們簡化塔德的說法，姑且用羅傑斯等人的 S 曲線來理解「創新」，那就是在這個第二階段中，塔德重視的是一種具有變化效果的力量。這個力量存在於數量的劇烈變化中：

$$dN(t)/dt > a \quad (1)$$

其中 N 是受影響或接受創新的總人數， t 是時間， a 是一個不等於零的正數。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思路來理解涂爾幹的社會觀。事實上，相較於塔德尋求社會中與時俱變的力量，涂爾幹是比較傾向於尋求另外一種造成穩定的力量，是持續作用在個體上，具有將所有個體凝聚在一個整體之中的效果。因此，如果個人之間有些什麼相同之舉，那是因為尊重他人或因為害怕輿論而為，而不是因為個體之間的模仿所致。涂爾幹稱之為社會印記 (*estampille sociale*) (Durkheim, 1897)。由於這個力量會將個人的行動推向整合的方向，這個力量的發生應當是：

$$dN(t)/dt \sim 0 \quad (2)$$

式 (2) 其實就對應於 S 曲線的第一和第三階段，特別是第三階段，也就是塔德指出的，統計學家重視的階段，而不是塔德關心的模仿擴散階段。顯然涂爾幹與塔德是在論述兩種不同的社會行動。如果我們假設一群人中的欲望和信念是守恆的，那麼第三階段的出現表示有另一條倒反的 S 曲線也同時發生。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不相同，而無法提供為參考。

其實塔德的模式也適合另一個可能，也就是第三階段後，有一個下降的第四階段：

$$dN(t)/dt < b \quad (3)$$

其中 b 是一個不等於零的負數。

這個第四階段也是一種擴散，是對當下普遍接納的信念或欲望的斥拒的擴散過程（Tarde, 1999c）。當然塔德的「創新」與社會觀不會停在這裡。至少，我們得瞭解那個作用在第二階段的力量到底是什麼。

（二）質與量的社會機制

依照塔德對社會現象的主張，對創新的理解方式可以建立在微觀的基礎上。換言之，塔德的社會觀近似於微觀社會學的立場，需透過對個體的行動以及互動來理解社會現象。然而就創新的結果論，其現象卻必須連結到巨觀層次，而不僅只限於微觀層次的觀察與解釋。塔德的「模仿律」本身就是一種連結個體行動與社會巨觀現象的主張。

模仿律雖稱為「律」（law），卻不是一般的律。一般的律是一種通則，是一種規範，不問其道理，只問其結果。模仿律卻是論及作為結果的社會現象是如何造成的，更何況模仿僅是個體行動中的一種選項。塔德自己在經濟心理學一書中，也承認使用「律」來指稱模仿現象不太妥當，之所以沒有用其他的語詞來替代之，純粹是因為「律」（loi）在法文只有一個音節，使用方便之故（Tarde, 1902a: 38）。更何況塔德本身對於規範並不熱衷，使以與涂爾幹對立之處。因此，模仿律等塔德的基本主張與其說是討論社會現象的規律，不如說是解釋

社會現象的發生與形成機制 (mechanism)。個體因其所處的社會位置，與其他位置者產生社會距離，而「心際心理學」就在社會距離中發生效果。模仿是行動者可以採取的一種行動選項，也由於這種行動的持續發生，社會現象得以出現。

塔德認為重覆現象是學科可以被建立的基礎：

生物學可以成為一門知識，是因為無數重覆的細胞，以及每個細胞所代表的重覆基本生命現象：受滋養、活動、成長、和繁衍等功能。生物的習性 (*habitude*) 和遺傳 (*hérédité*) 是生命重覆的形式，其週期性的移動是物理形式，其模仿則是社會形式。
(Tarde, 1999b: 51)。

這種形式的基礎就是心際相連的個體。社會生活必要的單元是雙人對偶 (*couple*)，且未必是異性雙人。這與齊梅爾所指的雙元體 (*dyad*) 是一樣的概念。只要是進入社會生活，人們就開始模仿他人，否則就必須創新。而即使是創新，也是有一大部分必須建立在過往的基礎上，這些基礎同樣也是模仿出來的。而且，一旦創新沒有被其他人模仿，也將與社會格格不入 (Tarde, 1999b: 59)。因此，社會事實之存在，必須有模仿，即「社會事實不變的特性就是模仿，而且此一特性專屬於模仿。故而社會性 (*socialité*) 不能優先於模仿性 (*imitativité*) 而存在」(Tarde, 1999b: 60)。

塔德進一步主張「正由於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模仿，提供了對於集體事實 (*faits d'ensemble*) 的解析性解釋 (*explication analytique*)」(Tarde, 1999b: 68)。這種觀點與晚近解析社會學 (*analytical sociology*) 所討論的社會機制 (*social mechanism*) 有鄰近之處。即

如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席林（Thomas Shelling）所稱，作為整體現象的「S 曲線不是社會機制，但其得以為某一社會機制所產生，而且可以被賦予一個如社會機制般的特定詮釋」（Shelling, 1998: 35）。作為一種中程理論（theory of middle range），社會機制的研究目的在於連結個體行動與集體現象，意圖跨越微觀與巨觀之間的鴻溝。但解析社會學的分析取徑有時會落入原子化的個體，依舊與塔德所主張的單子（monad）式個體有所不同。

從「單子」（monads）的意義出發，塔德意指之模仿並非單純的「量」的增加，而是一種兼具「質」的改變的過程。這與單純視 S 曲線為一種數量級數的變化，是非常不同的過程。萊布尼茲的單子論（*Monadologie*）對塔德發展出這樣的社會想像有非常大的影響¹⁷。從萊布尼茲的觀點來看，每一個微小的個人都是不可化約的，甚至即使形體歸於零，個體的意義依然存在。而且「每個單子必須和任何一個別的單子有分別，因為在自然中，不會有兩個實有，一個是和另一個完全相同，甚或不能找出一點內在相同，或基於內在特徵的差別」。¹⁸ 換言之，單子可以在物質性的部分消逝後，仍以精神或靈魂的形式存續，並與其他單子有所差異。

塔德因此堅定地主張社會學是一門心際心理學（*interpsychologie*），是發生在不同個體之間，存在於個體外部的一種心理學，而有別於一般心理學所探討的內在心理學（*intra-psychologie*）。

¹⁷ 塔德因此著作一本闡述單子論與社會學的書——*Monadologie et sociologie*（Tarde, 1999a/1893）。

¹⁸ 原文：*Il faut même, que chaque Monade soit différente de chaque autre. Car il n'y a jamais dans la nature deux êtres, qui soient parfaitement l'un comme l'autre et où il ne soit possible de trouver une différence interne, ou fondée sur une dénomination intrinsèque*（Leibniz, 1840）。

社會是建立在個體的關係或連結 (*lien*) 上，但不是單向的行為模式複製 (*copie*)，而是一種回應 (*réponse*)，基於個體的選擇，可以是模仿，也可以是反對。若是個體之間冷漠以對，就不會有社會。心際作用的連結使個體之間的社會距離縮短，眾多的個體因此得以如同波一般，向外產生一種「連結集合」或「關係」(association)。此即拉圖所主張的連結化(或關係)社會學(sociology of association)之由來。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把圖一的 S 曲線進一步提出另外一個可以微分的參數，那就是每一個不同的個體的信念與欲望 n_i 。此即塔德所謂的心理量，是可以量測的、可以累積的。

上揭式(1)到(3)所分析的是傳播過程中，信念與欲望的集體數量因時間的變化產生的效果。但如果我們從個體的信念與欲望累積增加的過程來看，會發現存在另外一種不一樣的現象。或者，根據塔德的說法，隨著已經受影響的人數增加，應當有另外一個力量存在於數量的增加與減少過程中。我們於是可以用下列式子來描述：

$$|dN(n)/dn| > c \quad (4)$$

其中 c 是一個不等於零的正數。或者，即如塔德如此敘述：「(社會生活中的模仿現象)達到一定程度的強度之後，就會成為自覺的需求，並且以猛烈和激進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需要」(Tarde, 2001: 249)，式(4)甚至可以再對 n 微分一次，而成為一個二次微分仍然大於零的表示，如此當更接近於一種物理上的力量，如牛頓力學之表示： $F=ma$ ，其中 a 為對時間的二次微分。但卻是因為群體當中個人的欲望與信念驅使所致，而不是物質上的人的增加。由於心理量就是社會距離的具體呈現，對心理量的二次微分就代表基於社會距離的加速度。以古典力學來解釋，力量(F)的強大與否，決定於質

量（ m ）與加速度（ a ）的乘積。如果質量代表創新事物本身的客觀價值，那麼依據古典力學的法則，加速度（ a ）越高或價值（ m ）越高，則創新的力量（ F ）越大，這正符合塔德的邏輯模仿律（*les lois logiques de l'imitation*）。對 S 曲線的理解應當如此，而不是庸俗地視其為人數的加總。

雖然塔德自承無法對信念和欲望下一個清楚的定義（Tarde, 1895），但以這兩種心理量或社會量來解釋社會，卻有幾個相當重要的意義。首先，從數量上來理解，每個生物性的個體有一定型態的存在，而且數量是固定的，但心理量卻是可以不斷地改變。其次，藉由信念和欲望的連結，所謂的社會才得以可能。生物性的個體因為有信念和欲望，可以與傳統相連結，語言、宗教也因此可以代代相傳。而且，信念和欲望除了得以跨越時間，更在空間面向有積極作用。在人群之間「只有通過信念和欲望，我們才既合作又競爭；只有通過信念和欲望，我們才有相似之處」（Tarde, 1895: 208）。塔德主張把個體分散的信念和欲望統整起來是合理的。這也是塔德主張民意（*opinion*）是來自於公眾，而公眾乃是精神的集合體，而不像群體心理學所主張之無意志狀態之群眾。¹⁹

透過信念與欲望也可以再帶回到與涂爾幹的對照討論。由於涂爾幹把社會當成是外在於個人的一種現象，微量人數的信念或欲望的增減並不會對社會產生影響，於是：

$$dN(n)/dn \sim 0 \quad (5)$$

¹⁹ 除了邏輯模仿律和超邏輯模仿律，塔德也注意到有些模仿行為確實是非邏輯（*illogique*）的（Schérer, 1999），以致於「瘋子引夢遊者走路」（Tarde, 1999d: 161），也就是發明的是瘋子，模仿的是夢遊者。

涂爾幹對於社會變遷的理解在於整個「質」的變化，當然他是利用「量」的事實呈現來主張「質」已經發生了改變，即如式（5）所表現的，那是一種已經穩定的狀態下，集體性的一種力量，結構因此可能發生了效果。結構所對應的是原子化的個人。但塔德的論證顯然是相反的。塔德從每個個體的變化來理解。「每個個體都是一個社會」（*toute chose est une société*）。個體的「質」發生了變化，其累積出來的結果就是一種整體「質」的效果。因此，作為「單子」而非「原子」的個體間模仿過程，就成為社會的基本屬性。塔德於是跳過了存在一種「結構」的意義，無涉於原子化下「量」與「質」的可能對立，而直接進入社會世界（social world）的理解（Latour, 2010）。

（三）重複（*répétition*）與差異（*différence*）

塔德對一般或普通社會學（*sociologie générale*）²⁰的主張是啟發自生物學的演化（Tarde, 1999b），而由三個主要的社會法則或社會律（*lois sociales*）所構成，包括重複律（*loi de répétition*）、反對律（*loi d'opposition*）以及適應律（*lois d'adaptation*）。他認為其中尤其是第一和第三律更為重要。塔德主張「模仿的」（*imitative*）之於社會學，就如同「遺傳的」（*héréditaire*）之於生物學，又如同「震動的」（*vibratoire*）之於物理學一般。塔德對於重複與反對律的欣然接受，是相當程度受到古諾的影響（Davis, 1906）。這個影響進一步呈現在塔德反對達爾文的演化模式，而是以一種「非連續原理」（*principe*

²⁰ 一般社會學涵蓋塔德三本主要的著作：《模仿律》（2001）、《普遍反對》（1999c）及《社會邏輯》（1999d）。這三本書分別說明三個社會律的內涵，參考附錄一。

de discontinuité) 來建構一個有機的社會形式，涵蓋三個屬性：模仿 (*imitation*)、猶豫 (*hésitation*)、以及發明 (*invention*)，剛好對應上述三個社會律 (Joseph, 1999)。

晚近有以複雜理論的觀點來理解創新現象，最大的貢獻之處在於提供一種非線性 (non-linear) 的主張。而此在塔德的社會觀中已經有了。塔德提及的三律中，重複律加上反對律有著非線性的屬性。複雜理論中的一個基本屬性就是分叉 (bifurcation)，也就是到一個關鍵點會發生截然不同的分叉路徑，²¹ 如圖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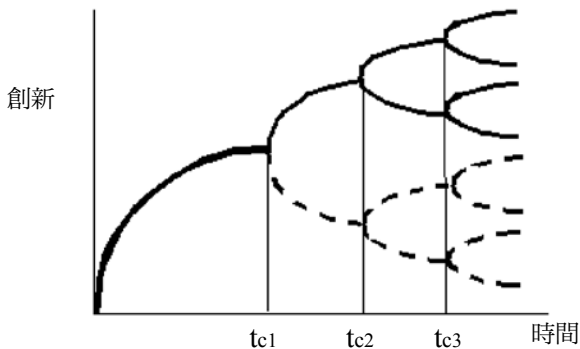


圖 2 創新中分叉 (bifurcation) 的發生

在創新的歷程中，分叉的發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一個創新通常會經過許多的分化，雖然最終穩定的結果具有主導性，或稱為主流創

²¹ 當然現實中也會有三叉、四叉或更多分叉的可能性，而不僅有雙叉的現象。但無論是塔德所主張的對立 (*opposition*)，或是複雜理論裡面的分叉 (bifurcation)，都是企圖用最精簡的、最根本的概念來處理複雜的現象。實則雙叉是三叉及多分叉現象的基本單元，即如三叉可以是兩個雙叉模式的加疊 (*superposition*)，依此類推。用雙叉的表達方式有助於人們從根本來理解複雜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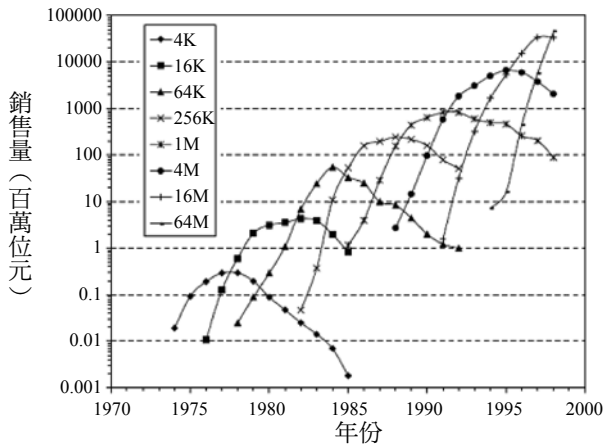
新，但其他的分化形式未必會消失，或仍小眾地存在。以圖 2 為例，某一創新伊始，經由初步的擴散，到第一個關鍵時間 t_{c1} 時，產生兩種穩定的選擇，一是強化創新，另一是弱化創新，也就是重複與對立。在這兩個穩定選擇之間是不穩定區域。²² 這兩條路徑再經過一段時間到達第二個關鍵時間 t_{c2} ，又分別產生重複與對立的現象。同樣到第三個關鍵時間 t_{c3} ，又發生重複與對立。當然整個歷程會持續下去，關鍵時間不僅限於三個時點，但可見到雖然主流創新逐漸明顯，創新現象卻也不斷地分化。

要特別說明的是圖 2 的現象並不同於演化樹。演化樹主要是在標示物種之間與共同演化祖先之間的關係，物種之間的樹枝連結線並沒有任何數量的意義。但圖 2 的縱軸是代表創新的累積數量，甚至是具有模型意義。故而圖 2 當中最上方的一條實線代表著主流創新的累積趨勢，其下方則有一系列不同的創新與時俱進，不斷分化。塔德在其著作中並沒有清楚將創新的曲線畫出來，但相較於圖 1 的 S 曲線，圖 2 的圖像或者更接近於塔德的模仿律所稱之現象。而且，此一圖像正可呼應晚近技術社會建構（SCOT）觀點下的技術演變主張（例如 Bijker et al., 1987; Bijker, 1995），即歷史上許多的創新之可以在社會中存在，並不是如同創新者原先的設想，而是經過幾多的社會過程而趨於穩定。例如自行車的演變過程包括不同性別與階層的社會團體對這項創新的不同詮釋、因此產生的爭議、對爭議的折衝協商、以及爭議的解決，終使自行車發展出現在的樣子，而達到穩定階段。

在現實的創新過程中，要以如式子（1）到（4）的線性模式來建構出非線性的創新曲線，而將圖二所示的所有分枝勾畫出來有一定的難度。然而在若干技術領域的實際創新歷程中，卻也不乏相應於圖 2

²² 關於穩定解與不穩定解的說明，可參考 Nicolis and Prigogine（1989: 72）。

的證據。例如在積體電路產業中，具有相當清楚技術發展軌跡的記憶體元件，會在一定的時間週期內發生世代交替的不斷創新現象。²³ 圖3所示即為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在1970到1990年代之間八個產品世代交替的產銷狀況。²⁴ 圖中有八道交替的曲線，分別代表從最小記憶容量的4K到較高容量64M的記憶體在市場上的產銷情況，而呈現一波又一波的消長現象。將圖3對比於圖2，會發現兩圖當中所有曲線的最上緣，也就是所有曲線整體外觀所形成的波型包絡線（envelope），具有一致性的形貌。



資料來源：修改自 Victor and Ausubel (2002)

圖3 DRAM 的產品世代創新

²³ 半導體積體電路產業中有所謂的莫爾定律（Moore's Law），就是用以描述技術發展具有規律的世代性。

²⁴ DRAM 是半導體積體電路產業中技術發展最具世代規律性的一種產品。雖然莫爾定律主要是用以描述 CPU 的發展路徑，但 DRAM 本身是一種邏輯記憶元件，功能非常狹隘、結構性非常明顯，更是必須配合 CPU 技術發展平行前進，因此其技術變遷反映出來的世代變化也就相較於其他半導體積體電路產品更為明顯。

由發明所造成的非連續因此成為創新的起源，也是社會的基本現象，而非常不同於涂爾幹式對社會變遷的理解（如 Tiryakian, 2009）。而且，不連續現象可以涵蓋圖一的模仿曲線。因為不連續是發生在一群曲線之間，而不是個別的曲線上。我們應當想像的是有一群 S 曲線在不同的空間與場域裡面同時或間歇地發生消長，而且這些曲線彼此之間也會有互動的關係，因為每一條曲線都是單子的積累，而單子是跨曲線存在的。這樣的想像豐富了塔德社會觀的時代性。因其同時存在了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斷裂性。甚至，斷裂與不連續是一種常態，而不同於達爾文的物種分化。即如塔德的追隨者所言，這是基於塔德所持之多源系譜（polygenism）原則（Tosti, 1897）。

德勒茲用另外一種更生動的方式來描述塔德的理念：

微觀模仿看來確實是在個體之間進行。但在同時，更根本的而言，模仿如同是一股流（flux）或一道波（onde），而非一個個體。模仿是一股流的傳導；對立是二元化，是將一股流變成二元性；而發明則是不同股的流之間的相互結合或連結。一股股的流，就塔德所見，就是信念與欲望之流。（Deleuze and Guattari, 1980: 267）

上面這段文字以及「千高原」的形象，與圖二或圖三應可有相當程度的呼應。此外，德勒茲更進一步將極微小的模仿、對立和發明當成是量子（quanta），用來標誌信念與欲望的擴展、分化與接合。在這種認識基礎上，社會與個體不會有差異，差異是存在於集體或個體表象的單元領域（*domaine molaire*），以及在信念與欲望的分子領

域 (*domaine moleculaire*)。由於量子匯成的流 (*flux*) 不能歸屬於個體，個體與社會的區別也就沒有意義。

個體的模仿與對立反映在歷史法則層面上就是一致與差異。齊梅爾論及時尚時，也主張時尚的本質是差異分化 (*distinction*) 與模仿的功能 (Simmel, 1904)。故而異質與斷裂的發生並不專屬於科技社會或後現代社會。若從日常生活中的互動關係來理解，塔德對社會現象的詮釋也很接近充滿了矛盾性的都會生活，因個人常常需要在眾多相互衝突的欲望與信念之間「猶豫」，並也凸顯了其中有意識與無意識並存的個人意義 (Borch, 2005)。再者，不單在時間與空間面向會有斷裂性，不連續也會存在於定型化的社會結構上。塔德即主張社會創新不免有階級或階層的社會等級存在，因此會有模仿過程中的「社會距離」 (*distance sociale*)，其亦是判斷政治民主程度的依據 (Tarde, 2001)。正面來說，此將豐富創新之內容；但反過來說，創新無非也是一種控制的過程。

(四)「演變」(*évolution*) 與「增長」(*progrès*)

塔德的心目中的社會是不停變化的，但是塔德所謂的演變 (*évolution*) 不是有機論 (*organisme*) 的演變，基本上，塔德是反有機論的 (*anti-organisme*)。對塔德而言，如史賓塞 (Herbert Spencer) 等有機論者的基本錯誤在於僅僅看到社會的外部變化，並據此建立起社會演變的歷史觀。事實上在一些社會現象中，例如語言和宗教等，並不能用有機論來解釋。塔德認為有兩種法則必須先說明清楚，一種是歷史法則，另一種是社會律，而社會律必須先於歷史法則。或換一種方式來講，社會律是內部的法則，歷史法則是外部的

法則，外部的法則是由內部的法則所產生的效果。社會律是生產性（*productive*）或再生產性的（*reproductive*），有別於歷史法則的演變性。而生產性的應該包括兩部分，一是質的部分，另一是量的部分。質的部分帶來不一樣的現象，量的部分則在於累積的效果，因此社會就是在不停的變化過程中存在。社會律可以說明包括語言與宗教等許多的社會現象，但歷史法則僅提供整體性的說明。用這樣的概念來重新看待 S 曲線，就發現過去強調這條線代表創新擴散的詮釋是有誤的。事實上，S 曲線僅是一種外部結果，重要的還是形成這條線的機制，也就是社會律。

一條 S 曲線或眾多 S 曲線的形成代表從演變到進步。塔德主張一個社會的進步（*progrès*）不僅是物質性的取得，更是信念與欲望數量與強度的變化所致：「社會愈進步，信念就愈豐富，欲望愈不豐富」（Tarde, 2001: 206）。從數量上來看，「文明進程中，欲望的數量增加，力度減少，但真理（*vérités*）和安全（*sécurités*）卻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數量與力度」（Tarde, 2001: 207）。這樣的主張，與西方宗教中欲望與信念常常是相互對立的理念一致。²⁵ 因此：

愈是進步的（*progressée*）社會，愈是具有一種靜謐的精神，
是穩定與安靜的，有執著的定意（*convictions fortes*），以及沈

²⁵ 即如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提及「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是一種欲望大於信念的具體現象。欲望作為一種原初的行動推力是顯而易見的。但一旦欲望被信念所替代，並成為行動決策選擇的基準，其乃發生如塔德所描述的「文明進程」。另外從「社會機制」的觀點，人在特定的情境下，確實會發生違背正常意志的行為舉止，那是信念與欲望相衡，瞬間欲望的報酬大於信念的報酬所致（Elster, 2007）。故而，即如塔德所言，在文明進程中，欲望並非有消滅趨勢，只是一般情況下，其力量是相對較薄弱的。

靜的情緒 (*passions mortes*)，是因欲望使得信念逐漸被構化 (*crystallisées*) 而成。(Tarde, 2001: 206-207)

另外，進步也代表著理性化的程度。塔德認為是標誌著文明進步的「理性」(*raison*) 不是憑空發生，而是模仿得來。「理性和其他的需求 (*besoins*) 一樣，只是一種特別的需求；這種需求也靠獲得滿足而發展，發明和發現使其滿足，並使其發生」(Tarde, 2001: 210)。因此，若依據塔德的主張，人們的日常使用的工具理性並非與生俱來，否則就不需要在孩童教育中置入基本的算術、語言等課程。

同時，塔德也沒有忽略科技在社會變遷與進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 19 世紀，交通運輸工具的發明使人際關係的增加超乎一切意料，模仿行為更加有力、更快、意義更加深遠，所以社會改革的激情，和有系統而理性地重組社會的激情，就達到了目前的規模。(Tarde, 2001: 210)

技術的進步使模仿增加，但並不保證創新就會增加。科技的效果使得創新的機會提高，但如果沒有足夠的時間讓信念被構化，或被沈澱下來，創新消逝也快。這是現代社會必須面對的挑戰。更進一步言，塔德主張的演變其實包括兩種重要的形式：取代 (*substitution*) 與累積 (*accumulation*)。演變是零碎的、普遍的、且是小規模的，因其乃建立在個別單體的發明，並且之後的擴散。這種情況下，就沒有所謂的普遍真理 (*vérité*)，而只有多元性的真理 (*pluralisme des vérités*)。因此，圖 2 的線條比起圖 1 的 S 曲線，或者更能夠反映出創

新的真實面貌。

總言之，塔德以類似「質」與「量」的討論來探討社會變遷。「演變」(évolution) 一般要表達的意思在於整體性的轉變，是「質」中心的一種概念。「增長」(progrès) 則偏向一種「量」的提升。通過質的演變分析，從這裡出發的是一種對經濟生活的全新認識，是來自於內在的演變，為單體的利益（欲望與信念）所驅使，而不能藉由外部的分析（Latour and Lepinay, 2008）。故而對於創新經濟的討論，塔德的經濟心理學與主流的經濟學也非常不同（Barry and Thrift, 2007）。但在分析的技術上，塔德在其所處的時代面臨窘境。他所能提供的，僅止於既有的心理學工具，其餘的僅能用想像（Latour, 2010）。這也是塔德沒辦法提供更多有效的證據來支持其論述的原因之一。

五、在現代社會中的社會創新如何可能？

（一）創新：不能治理與難以區分

當前大部分創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供治理創新的知識，然而創新是否可以治理？在組織研究的學術傳統中，雖然沒有看到塔德的名字，但有與塔德的主張異曲同工之妙者，並不少見。在傾向以互賴（inter-dependence）或決策分析（strategic analysis）的組織研究學派中（如 Crozier and Friedberg, 1977），塔德的主張是有一定的鄰近性。另外，在組織制度學派方面，塔德主張的模仿，也被視為是組織制度形成與擴散的一種基本類型，而與制度學派的所謂模仿同

型（mimetic isomorphism）可以相提並論，使得塔德的創新主張，亦得以立足於組織研究領域（Czarniawska, 2009）。對此一現象，策略分析學派的主張是：創新不能治理（*Manager recherche et innovation apparaît impossible*），因為結構因素並不是原因，而是結果（Crozier, 1994）。

創新不能治理的理念可以總結塔德的主張來理解。社會就是模仿、反對以及調適所建立的三個社會律為基礎，而且是以心際活動為基本單元。一個以創新為常態的社會觀，就是建立在動態的基礎上，也就是一種關於「重組中（resembling）的社會」的想像。塔德認為當下的狀態應該是先前調適（或創新）所產生的結果，重點不在於當下，而是先前。換句話說，塔德主張調適是將變遷作為解釋狀態的條件，但狀態是無法解釋變遷的。當熊彼德論及經濟發展中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時，其所要表達的意義在於一種劇烈的、具有斷裂性的經濟變遷（Schumpeter, 1942）。如果經濟變遷是社會變遷中一環，熊彼德的觀點無疑是主張一種個體的行動在社會變遷中的積極現象，而與塔德所主張的「發明作為社會演變的動力」（Tarde, 1902b）是接近的，都是反對制度或結構決定論。塔德主張創新不是制度驅動，而是模仿發生的。但制度並非無用，作為行動者情境條件的制度，確實會影響到超邏輯的模仿。故而制度調整的效果至多也僅於此。但不能忽略的是，制度也是模仿而來的，即以塔德的主張，制度變遷應屬一種歷史法則的現象。

再者，塔德使用「創新」一詞並不完全等同於「社會創新」之創新。塔德是在社會律的討論中帶入創新的概念，是指一個個體未必完全接受其他個體的信念與欲望，故有發明與創新之可能。而發明與創新不可能是完全不同於過往的全新狀態，而是必須建立在相當程度過

往的基礎上。而且，由於個體的自由選擇，創新是一種常態現象，亦是造成分化的條件。而現今一般所謂之社會創新乃是一種目的性的，同時也是在巨觀層次上的現象，具有衝擊或改變制度的意涵。依據塔德的社會觀來理解這種現象，只能將之視為是一種歷史法則層面的現象，是結果的呈現，而不是社會律層級討論的範疇。

更進一步言，晚近所謂的社會創新雖然標示著「社會」，實則是為了與其他具有經濟目的的創新活動區隔。基於塔德式的創新觀點，這樣的區隔是沒有意義的。塔德對經濟生活的分析主闡述在經濟心理學一書²⁶。這本書最開頭的介紹部分，就已經揭示了經濟生活的理解是可以全然納入塔德的社會觀之下，也就是在社會律當中。從塔德的社會觀來理解創新，無疑經濟上的創新也是同文化、語言或宗教一般，根本上是在兩類的模仿律中發生：邏輯的以及超邏輯的模仿律。經濟活動可以歸納出兩種欲望的類型，一種是供應的欲望，另一種是需求的欲望（Tarde, 1902a: 176）。換言之，就是「賣」的欲望和「買」的欲望。這兩類的欲望都會在人與人的心理之間產生交流和傳播的效果，而受到創新力量的影響。即如前述半導體記憶體的案例，其雖可以藉由市場的網絡關係來理解（White, 1981），但更多是具有科技文化意涵的一種轉變歷程。因此，一旦將創新現象放在欲望與信念分析的層次上，社會與經濟的創新就沒有太大差別了。

透過後來者對塔德學說的諸般討論，塔德對創新現象的貢獻，顯然是一種非常開放的大膽嘗試，具有非常大的跨界可能性（Barry and Thrift, 2007）。換句話說，塔德式的社會學不僅止於社會學，不僅止

²⁶ 此書主要是用社會律來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對話，其原書名應為《經濟的交互心理學教程》（*Cours d'inter-psychologie economique*），是為了使書名簡潔，才改成《經濟心理學》。

於經濟學，也不僅止於心理學。那是一門全然為創新作為一種基本社會現象而設計的「普通社會學」(*sociologie générale*)，是一種比牟斯(Marcel Mauss)更徹底的整體性觀點，而沒有把自己設限。

(二) 創新及其不滿

以塔德的社會觀來理解創新確實較主流社會學更具有概念與現象的親近性。但誠如塔德所言，創新仍然要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上。社會學發展超過一個世紀以來，涂爾幹式的社會學也不是唯一的範式，有更多元的社會學觀點被提出，社會學的基礎有了相當多的改變，塔德的觀點一定有其不足之處。因此，塔德式的創新觀點也必須同樣面對時代性的挑戰。

首先，塔德式社會觀的核心理念，也就是信念與欲望，依舊難以精確予以定義，因此也依舊難以對創新現象予以更加精確的描述或解釋。更何況在信念與欲望之先，也許還有更基本的心理或社會量存在，即如Elster(2006)所言，雖然信念和欲望可以作為行動的理性基礎，但情緒(emotion)也會影響到信念與欲望。信念與欲望應該如何具體化呈現出來，仍然有值得發展的空間。

其次，雖然塔德主張每個個體都是社會，因此否定客觀外在的社會，但以創新的現象來看，確實不能完全否定結構影響的效果。如果把「邏輯模仿律」(*les lois logiques de l'imitation*)視為創新的常態，也就是說，以創新對象本身的屬性作為模仿難易的主要標準，而將受到其他因素影響發生的創新現象視為例外，並將其納入「非邏輯原因所致」(*causes non logiques*)，那麼在模仿律一書中，被塔德歸結為「邏輯模仿律」的創新現象明顯是少於受「超邏輯模仿律」(*les lois*

extra- logiques de l'imitation) 所支配的創新，如此一來，例外的比例也實在太高了。塔德在這裡提出「超邏輯模仿律」，目的就在用以解釋非邏輯原因所致的創新現象。塔德雖然反對客觀存在於個體之外的社會，實則是將結構的效果放在超邏輯模仿律的範疇。他所提出的一些非邏輯模仿現象，例如與主導文化的親近性造成的易滿足或愈相容效果，會促進模仿的發生，就包括由上而下發生的創新形式，而這種形式誠然就是一種結構的效果。如今社會學已經不再強調結構與個體的對立，採取結構與個體的互補性反而是塔德的創新觀點可以進一步豐富之處。

最後，塔德式的觀點在相當程度受到當時唯科學主義的影響。在塔德的著作裡，每有論述就必須提出與物理學和生物學相應的對稱解釋。這種論述方式會為創新的社會學詮釋帶來一定程度的侷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學以外的其他學科，同樣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有了非常巨大的變化，這在物理學和生物學兩個科學領域尤其顯著。不侷限於過往與當下的學科範疇，持續進行跨學科間的彼此參照啟發，理當有助於對社會與創新的理解。而藉助其他學科已然純熟的研究工具，用以詮釋人際的創新現象，不啻亦是塔德所主張的理解社會／創新如何可能的基本精神。

六、小結

我們透過對古典社會學的理解，無非是希望能夠「鑒往知來」，特別是對於著作早已經在時代中淹沒的思想家們，他們的理念可以重見天日，表示有可以跨越人類歷史發展的鴻溝，且有值得我們這個時

代來借鏡之處。雖然涂爾幹擅場的時代長達一個世紀，其中亦不乏批評挑戰者，但塔德理念的復活，相較於過去長期以來持續對涂爾幹的多方挑戰，卻更是饒有豐富的意義。這當與我們現下的處境有密切關係，因我們正處於一種劇烈的變遷狀態，而且這種變遷是希望被視為正面的，而不是意圖予以壓抑的。以致於在情境上，更接近於塔德理解社會的基本立場。把塔德從塵封檔案中重新翻出，一方面回應了當前時代對創新現象的束手無策；一方面也顯現塔德的思想具有跨時代的重要意義。

要問社會創新如何可能，應要先問理解社會創新如何可能，或者說，從社會理論來理解社會創新如何可能。若從以上對塔德的思想分析，我們可以說創新是無所不在，且其機制是最根本的社會律。社會創新源於最根本的個人創新，是個別發明與個人模仿的交互過程所積累之結果。但這樣的結果必須建立在有別於過去的觀察角度上，才得以被發覺。藉由以上的討論，有三個方向可能是必須予以重視的。

第一個方向在於跳脫質與量的二分、結構與行動的雙元思維。質與量的「混搭」是塔德對社會進行研究的基本主張。創新是社會可以被辨識的基本條件。由於不斷的創新，人與人可以連結起來，在一波又一波的心際傳播過程中，社會得以存在。甚至創新是超越物質性的個體而發生，是以信念與欲望的擴散方式形成了公眾 (*publique*)、形成了輿論 (*opinion*)、也形成了社會。從塔德的社會觀來理解創新的現象，不能僅用模仿律，而是必須把三條社會律都同等看待。因此，創新的效果不是純粹數量的累積，而是牽涉到集體信念或精神的改變，是一種質的表現。

第二個方向在於一種視不連續為常態的態度。線性與連續性比較符合人類的直觀想像。人們進行推論或推理多傾向建立在一種具有慣

性的思維基礎上。因此，一旦論及變化，大多數人們包括社會科學家多半或採取一種保守的立場，也就是先建立起一個較為穩固確定的思維架構，或可以較清楚界定的概念平台，據此勾勒出或釐清變化的方向、軌跡或程度等。換言之，思維者心中通常已經建立起一個想像的社會實體，再以此為連續或線性變化的起始原型。包括 S 曲線也是這樣的概念。然而就塔德的社會律而言，確實並沒有這樣一個穩定態的社會，社會是在互動（模仿或反對）的過程中存有的，且其變化是非線性的，甚至有多個空間向度同時併存變化，而不能謂之連續。

第三個方向是對如福樓拜（Flaubert）等追求科學客觀、強調寫實、無法忍受不確定或變化者而提出的建議。涂爾幹及其門徒在一百年前對社會學下了一個非常技巧性的定義，透過社會事實的界定，讓社會學有了與其他學科可以清楚區別的疆界。如果社會學具有讓人洞悉混亂時局中如何可以維持秩序，那麼這樣的具有安撫人心的目的性是更勝於告訴人們社會原本就是不斷在變化。這也是像福樓拜這一類比涂爾幹更早一代的人所追求的。然而，當一個學科畫下了領域疆界，也是對創新理解的侷限。雖然同時代的塔德也用社會學這一詞，但他更開放地使用心理學、經濟學等其他學科工具來理解社會如何可能。如果能抱持同樣開放的態度來看待創新，創新並不同等於革命，而且創新並不總是危險的。

附錄、塔德與涂爾幹重要著作列表

年代	塔德著作	涂爾幹著作
1890	<i>Les lois de l'imitation</i> 《模仿律》	
1891	<i>Les transformations du droit. Étude sociologique</i> 《法律的變遷——社會學研究》	
1893	<i>Monadologie et sociologie</i> 《單子論與社會學》	<i>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i> 《社會分工論》
1895	<i>La logique sociale</i> 《社會邏輯》	<i>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i> 《社會學方法之規則》
1897	<i>L'opposition universelle: Essai d'une théorie des contraires</i> 《普遍對立——相反理論散論》	<i>Le Suicide</i> 《自殺論》 <i>La Prohibition de l'inceste et ses origine</i> 《亂倫禁忌及其起源》
1898	<i>Écrits de psychologie sociale</i> 《社會心理學著作》 <i>Les lois sociales. Esquisse d'une sociologie</i> 《社會律——社會學概論》	
1901	<i>L'opinion et la foule</i> 《意見與群眾》	
1902-3	<i>La psychologie économique</i> 《經濟心理學》	
1912		<i>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i>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參考文獻

外文部分

Alliez, Eric

- 2004 “Th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of Gabriel Tarde,” *Distinktion: Scanda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9: 49-54.

Baller, Robert D. and Kelly K. Richardson

- 2002 “Social Integration, Imitation, and the Geographic Patterning of Suicid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6): 873-888.

Barry, Andrew and Nigel Thrift

- 2007 “Gabriel Tarde: Imitation, Invention and Economy,” *Economy and Society* 36: 509-525.

Bijker, Wiebe E.

- 1995 *Of Bicycles, Bakelites, 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ijker, Wiebe E.,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J. Pinch

-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orch, Christian

- 2005 “Urban Imitations: Tarde’s Sociology Revisited,”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2(3): 81-100.

Boudon, Raymond

- 1971 *La Crise de la sociologie: questions d'épistémologie sociologique*. Paris: Droz.

Clark, Terry N.

- 1969 “Introduction,” in Terry N. Clark ed.,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72.

Coleman, James, Elihu Katz and Herbert Menzel

- 1957 “The Diffusion of an Innovation Among Physicians,” *Sociometry* 20: 253-270.
- 1966 *Medical Innovation: A Diffusion Study*.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Crozier, Michel

- 1994 “Peut-on manager la recherche et l’innovation?” *Politiques et management public* 11(2): 11-16.

Crozier, Michel and Erhard Friedberg

- 1977 *L’Acteur et le système*. Paris: Edition du Seuil.

Czarniawska, Barbara

- 2009 “Gabriel Tarde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in Paul S. Adl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6-267.

Dandurand, Louise

- 2005 “Réflexion autour du concept d’innovation sociale, approche historique et comparative,” *Revue française d’administration publique* 115: 377-382.

Davis, Michael M.

- 1906 *Gabriel Tarde: An Essay in Sociological Theory*. Doctorate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Deleuze, Gilles

1968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0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Mille Plateaux*.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Durkheim, Émile

1893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895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897 *Le Suicid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04 “La Sociologie et les Sciences Sociales. Confrontation Avec Tard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12: 83-84.

Edgerton, David

1999 “From Innovation to Use: Ten Eclectic These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 *History and Technology* 16: 111-136.

Elster, Jon

2006 *Raison et raisons*. Paris: Fayard.

2007 *Agir contre soi*. Paris: Odile Jacob.

Flaubert, Gustave

1913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Paris: L. Conard.

Joseph, Isaac

1999 “Gabriel Tarde: Le Monde Comme Féerie,” in Gabriel Tarde

ed., *Les Lois Sociales*.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pp. 9-36.

Katz, Elihu

1999 “Theorizing Diffusion: Tarde and Sorokin Revisite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6: 144-155.

2006 “Rediscovering Gabriel Tard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3: 263-270.

Kinnunen, Jussi

1996 “Gabriel Tarde as a Founding Father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Research,” *Acta Sociologica* 39: 431-442.

Latour, Bruno

1999 “Pourquoi Viens-tu si Tarde? (Comment Trouver un Successeur au Structuralisme),” *La Recherche* 320: 81.

2001 “Gabriel Tarde and the End of the Social,” in Patrick Joyce eds., *The Social in Question: New Bearings i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pp. 117-132.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Tarde’s Idea of Quantification,” in Mattei Candea ed., *The Social after Gabriel Tarde: Debates and Assessments*. London: Routledge, pp. 145-162.

Latour, Bruno and Vincent Lepinay

2008 *L’économie, Science des Intérêts Passionnés*.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Le Bon, Gustave

1895/1988 *Psychologie des Fou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eibniz, Gottfried

1840 “La Monadologie,” in Johann Eduard Erdmann ed., *Leibniz Opera Philosophica Quae Extant Latina Gallica Germanica Omnia*. Berlin: Eichler, pp. 705-712.

Leroux, Robert

2004 *Cournot sociolog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uhmann, Niklas

1998 *Observations on Modern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hajan, Vijay and Robert A. Peterson

1985 *Models for Innovation Diffusion*. London: Sage.

Martuccelli, Danilo

1999 *Sociologie de la Modernité*.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Michaelides, Panayotis and Kostas Theologou

2010 “Tarde’s Influence on Schumpeter: Technology and Social Evol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37: 361-373.

Mucchielli, Laurent

2000 “Tardomania? Reflexions sur les Usages Contemporains de Tarde,”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 2: 161-184.

Mulkay, Michael J.

1972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novatio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Nicolis, Gregoire and Ilya Prigogine

1989 *Exploring Complexity*.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Pol, Eduardo and Simon Ville

2009 “Social Innovation: Buzz Word or Enduring Term?”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8: 878-885.

Rogers, Everett M.

1995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Schérer, René

1999 “Homo ludens—Des stratégies vitales,” in Gabriel Tarde ed., *La logique sociale*.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pp. 17-56.

Schumpeter, Joseph A.

1912/1934/1951/196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Schelling, Thomas C.

1998 “Social Mechanisms and Social Dynamics,” in 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2-44.

Simmel, Georg

1904 “Fashio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0(1): 130-155.

Tarde, Gabriel

- 1895 *Essais et mélanges sociologiques*. Paris: F. Alcan.
- 1898a “Les deux éléments de la Sociologie,” in *Annales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ociologie, VIII. Etudes de Psychologie Sociale*. Paris: V. Giard & E. Brière, pp. 63-94.
- 1898b “La Sociologie,” in Gabriel Tarde ed., *Etudes de Psychologie Sociale*. Paris: V. Giard & E. Brière, pp. 73-105.
- 1902a *La Psychologie économique*. Paris: F. Alcan.
- 1902b “L’invention Considérée Comme Moteur de l’évolution Social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7: 561-574.
- 1969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ed. by Terry Clark.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99a/1893 *Monadologie et Sociologie*.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 1999b *Les lois sociales: Esquisse d’une sociologie*.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 1999c *L’opposition universelle: Essai d’une théorie des contraires*.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 1999d *La logique sociale*.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 2001 *Les lois de l’imitation*.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 2002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et Science Sociale*.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Taymans, Adrien

- 1950 “Tarde and Schumpeter: A Similar Vi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4(4): 611-622.

Tiryakian, Edward

2009 “Émile Durkheim and Social Change,” in Edward Tiryakian ed., *For Durkheim*. Surrey: Ashgate Pub, pp. 63-68.

Toews, David

2003 “The New Tarde: Soci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Social,” *Theory Culture Society* 20(5): 81-98.

Tosti, Gustavo

1897 “The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Gabriel Tard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3): 490-511.

Van den Bulte, Christophe and Gary L. Lilien

2001 “Medical Innovation Revisited: Social Contagion versus Marketing Eff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1409-1435.

Vargas, Eduardo Viana et al.

2008 “The debate between Tarde and Durkhei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6: 761-777.

Victor, Nadejda M. and Jesse H. Ausubel

2002 “DRAMs as Model Organisms for Study of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69(3): 243-262.

Wejnert, Barbara

2002 “Integrating Models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297-326.

White, Harrison

1981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517-547.

Abstract

Innova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that Gabriel Tarde concerned in developing his general sociology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However, the fruit of Tarde's efforts upon this subject was ignored for quite a long time since his academic rival Durkheim gaining orthodox status of the sociological discipline. This paper is aimed at rediscovering Tardean sociology, or Tarde's point of view about society, and making connections with current studies of innovations. Tarde rejects Durkheim's abstract concept that a society exists external to individuals. He argues that only social laws, or laws of inter-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imitation, opposition and adaptation, can form a society. By these laws, belief and desire are basic social quantities that transfer between individuals to constitute associations. Changes in belief or desire cause innovations. Innovations are therefore by nature basic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society formation. Also as a driving force to social change, innov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progres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a society. Moreover, innov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a linear process. It can be multi-dimensional and discontinuous. A tot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s therefore required to the study of innovation.

Keywords: innovation, social innovation, Gabriel Tarde, Laws of imitation, social laws